

## 梁启超与日本：学术回顾与展望

作者：崔志海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3-14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位百科全书式人物，海内外研究他的论著不计其数。对近百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的梁启超研究进行学术回顾，绝非这篇短文所能胜任。本文仅就近年学术界比较关注的有关梁启超与日本关系的研究做一回顾和总结，希望能对梁启超研究有所裨益。

### 一、一个简单的学术回顾

梁启超—生流亡日本14年，他的思想曾在许多方面受惠于明治日本，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梁本人就曾将接触明治日本思想比做“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1]，“脑质为之改易”[2]，“思想为之一变”[3]，称日本为他的第二故乡[4]。在有关梁启超与日本关系的研究中，日本学者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始终走在学界的前列。

早在20世纪4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在考察近代日本思想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时便将梁启超作为一个重要案例进行研究。如日本学者中村忠行在探讨日本文学对近代中国文学的影响过程中，就曾对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小说理论和政治小说的创作及其文体与明治日本的关系做过深入的分析，认为梁启超所用的“新民体”和他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等有深厚的日本根源。[5]此后研究梁启超政治小说和文学思想与明治日本关系的论文还有大村益夫的《梁启超すよび〈佳人奇遇〉》（《人文论集》第11卷（1964年），第103-133页）、山田敬三的《汉译〈佳人奇遇〉纵横谈——中国政治小说研究札记》（赵景深编《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402页）、斋藤希史的《新国民之新小说——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文学界》（广东康梁研究会编《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252页）。此外，永井算己的《清末における在日康梁派の政治動靜》[6]，根据日方档案资料，对梁启超在日本的活动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宫村治雄的《梁启超の西洋思想家論—その“東学”との關連において》[7]，较为全面地论述了20世纪初梁启超所介绍的西方思想家与明治日本思想界的关系，为90年代以来研究梁启超启蒙思想中的东学背景的学者广泛引用。

进入90年代之后，由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教授于1993-1996年主持的“梁启超研究——关于他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过程”的研究班，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8]在该研究班的推动之下，国际学界围绕这一主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先后在欧美分别举办两次相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5年，由曾经作为该研究班成员的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教授主持在法国举办了一次“欧洲思想与20世纪初年中国的精英文化”研讨会。此次会议虽然以1900年至1920年间欧洲思想如何进入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为主题，但由于这一时期中国人接受欧洲思想，很大部分是通过相关的日译或日文著作，因此，在提交此次会议的论文中有不少学者谈到日本对梁启超接受欧洲思想的影响和作用，如日本学者佐藤慎一的《20世纪初中国对社会进化论的接受——与日本案例的比较》(Chinese Acceptance of Social Evolutionism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Comparison with Japanese Case)、狭间直树的《梁启超来日后对西方近代认识的深化——尤其在“国家”与“国民”方面》、石川祯浩的《近代中国的“文明”与“文化”》、高柳信夫的《1900年代中国关于“科学”的言论的几个侧面》、斋藤希史的《关于近代中国文学进化观念：白话文诞生的前夜》、森时彦的《清末知识界对西欧经济学说的接纳：梁启超的经济思想》等。[9]此外，狭间直树教授在《梁启超研究与“日本”》(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4期)一文中，又对梁启超与日本学者吾妻兵治的关系进行钩稽，力图为吾妻兵治翻译的《国家学》在未公开出版之前率先由梁在《清议报》上翻译发表寻找一个合理的答案。[10]

1998年，由另一位曾作为梁启超研究班成员的加州大学教授傅佛果(Joshua A. Fogel)主持在美国召开了一次题为“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启超个案”的研讨会。在提交会议论文的15位学者中，日本学者又占了一半，计有8人，成为会议的主角。其中，狭间直树的论文考察了梁启超《新民说》中“公德”和“私德”观念中的日本思想背景；森时彦的论文通过对梁启超文章中所用“生计”和“经济”词汇变化的考察，揭示其背后所隐含的丰富的经济思想方面的内容；森纪子的论文探讨了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所受日本佛教思想界的影响；石川祯浩的论文详细考察了20世纪初年梁启超地理学著述和地理学思想与明治日本思想界的关系。有关此次学术会议的缘起以及论文题目和简要，详见桑兵《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启超个案国际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一文，兹不赘述。

1999年，由狭间直树主持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终于由东京みすず书房出版。经补充修订，2001年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书名为《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该书共收14篇论文，文章的作者除法国的巴斯蒂教授外，其余都为日本学者。其中，狭间直树的文章强调日本在梁启超所著《新民说》中的作用，认为“以《新民说》为代表，梁启超的署名‘中国之新民’的百余篇文章以及东渡日本后写下的其它文章，多是以日本的知识 and 思想积累为媒介完成的”。石川祯浩的文章研究了盛行在明治日本思想界中的文明论思潮对梁启超的影响，指出“作为带有普遍意义的‘文明’的观点，在汇入明治时期日本的社会潮流后，大大地启发了梁启超，由此织就的历史观、地理决定论、帝国主义认识，使他成为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地理学、国际政治学等的开山鼻祖”。土屋英雄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初年梁启超在摄取西方“自由”、“权利”观念中所受日本思想界的影响以及梁氏本人的因素。末冈宏的文章考察了梁启超的经学和诸子学研究与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并指出梁氏之所以在他的经学和诸子学研究中导入以井上哲次郎等官学体制派为中心的中国哲学研究，目的是“用这些人的部分理论来印证自己所想的政策或主张”。森时彦的文章揭示了梁启超的经济思想如何受到日本学界所吸收的经济学说及其所处时代的影响。森纪子的文章探讨了梁启超的佛学研究与日本佛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山田敬三的文章详细论述了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一文所受末广铁肠《二十三年未来记》的影响。斋藤希史的文章分析了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文学形成所做的贡献和梁所借助的塑造国民灵魂的政治小说与明治时期日本文学之间的关系。[11]这些学者的论文从不同角度展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所受明治日本思想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及其复杂性，代表了目前国际学术界在梁启超思想与日本关系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一个最新成果。

除日本学者的研究之外，一些研究梁启超思想的英文著作也程度不同地注意到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如美籍华裔学者张灏所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虽然沿袭美国汉学家李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一书提出的问题，重点考察梁启超思想中的中国传统因素与近代西学因素及其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同时也尝试对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提出一个总体性的看法。他认为，虽然日本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梁启超的思想，但这些影响主要局限在工具理性层面，就道德和社会价值观来说，传统的日本思想并没有单独对梁构成重要的影响，与梁启超思想中的西学因素和传统因素相比，日本因素只是“将梁思想背景中本已存在的某些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成分结合起来，并得以加强。”[12]与张灏淡化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不同，另一位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则将日本因素作为梁氏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加以重视，在所著《梁启超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一书的第3章具体考察了大隈重信、犬养毅等的大亚洲主义、福泽谕吉等的文明论和加藤弘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梁氏思想



的影响[13]，认为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是经过梁氏重新阐释之后的传统儒家思想、明治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的一个混合物。[14]另外，法国学者巴斯蒂教授曾就梁启超思想中的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国家论的日本渊源做过深入的考辨，认为1899年6月发表在《清议报》上的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并非梁启超所译，1903年10月发表在《新民丛报》第38-39号上署名梁启超的文章《政治学大伯伦知理之学说》，其实也非梁氏本人的作品，它们都是抄袭了1899年日本东京出版的吾妻兵治翻译的《国家学》，并对梁在抄袭过程中对译本加以取舍的原因和伯伦知理国家学说对其国家观念的影响做了具体分析。[15]该文发表后，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另一篇长文《梁启超与宗教问题》中，巴斯蒂教授又对梁启超宗教思想的演变与日本学界的关系做了相应的考察和分析。[16]

相对国际学界来说，国内对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关系的研究则显滞后。虽然早有学者揭露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多系“抄袭”日文[17]，拾日本人的“唾余”[18]，但有关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关系的话题，迟至中日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随着学术研究的转向[19]，才逐渐进入有关学者的研究视野。其中，研究较多的是考察20世纪初年梁启超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其所创作的政治小说及新文体与明治时代日本政治小说和文体的关系。[20]另外，有的尝试综合分析明治日本对梁启超政治思想层面的影响。[21]有的就梁启超的启蒙思想与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进行比较，揭示这两位启蒙思想家的近代化思想的异同。[22]有的考察明治日本思想对20世纪初年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影响。[23]有的考察梁启超日本观的演变。[24]有的探讨与日本有着密切关系的梁启超国学研究为什么不被日本学界所看重的原因。[25]有的对梁启超文章中康德学说的日本、西洋和中国传统等各种思想因素和相互关系，以及梁氏本人的误会、加工和会通做了深入的剖析。[26]

国内研究梁启超与明治日本关系的一个最新成果，是2003年10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的郑匡民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该书系由作者的博士后论文修改而成，共7章，计27万字。该书在研究方法方面继承了狭间直树教授主持的“梁启超研究班”的做法，通过将梁启超的文章与日文著作进行缜密的对勘和比较，具体揭示梁启超到底在哪些方面受了明治日本思想的影响，受了哪些日本思想家和日文或日译著作的影响，以及在摄取过程中梁本人做了哪些选择和修改。通过对勘和比较，作者指出：梁启超当年以西方文明为终极目标的一元化近代化理论和在摄取西洋文明方式上的精神文明优先论，以及“新民”的立国主张，深受有“东方伏尔泰”之称的福泽谕吉思想的影响，梁氏《文明三界之别》实际上只是祖述福泽谕吉的观点，同时将福泽谕吉的文明、半开化、野蛮三阶段论纳入其“三世说”的理论框架之中。反映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新民说》和《自由书》一方面摄取了明治时期另一位著名思想家中村正直的思想和他所译《西国立志篇》和《自由之理》著作中的内容，但在如何改造民众、树立新民问题上，梁并不接受中村正直所强调的儒家敬天爱人和西方基督教精神的作用，在引用中村正直的文章时，特意对体现这一思想的文字做了篡改；同时，受中村正直翻译的影响，梁在宣传穆勒自由主义思想过程中将穆勒《自由论》中一再讨论的“社会”与“个人”对立的问题转变成“政府”与“人民”的对立问题，从而抽去穆勒《自由论》中限制社会暴虐、确保个人自由的主题，“使得梁启超无缘领会近代自由主义的主流思想”。梁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的《霍布士（Hobbes）学案》、《斯片挪沙学案》、《卢梭学案》、《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等一系列介绍近代西方思想家和学说的文章，大部分是以中江兆民的《理学沿革史》为蓝本，同时，梁氏有关“文明之自由”、“野蛮之自由”、“思想之自由”的论述，很大程度也为中江兆民自由观的翻版，将自由的最终目标放在“向上以求宪法”、“排外以伸国权”上，隐含着只重视政权、集体全体权利和“积极的自由”，而忽视个人“私权”和“消极自由”的巨大危险。梁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和《论教育当定宗旨》等文中所表达的有关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见解，直接受明治昭和时期教育家和政治家高田早苗《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及日本政治学者浮田和民《日本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理想》等书的影响，但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纯属防范与自卫性质，并不具有明治日本国家主义思潮所具有的那种进攻性和侵略性。梁启超放弃卢梭天赋人权说，宣传强权论，基本上只是祖述日本德意志国家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加藤弘之的观点，稍有不同的是梁用他所熟悉的公羊“三世”说理论，描述加藤弘之有关强权经由“偏颇的进步”向“普遍的进步”，最后形成“宇内统一国”的发展过程。梁启超接受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理论也是深受明治日本思想的影响，由于明治日本在输入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国家学理论时有意淡化伯伦知理国家学说中反对君主专制统治、主张建立近代国民国家等带有进步性的内容，将其主张国家至上的保守性一面加以发扬和利用，以便为明治政府建立一个国权优于民权的国家服务，结果致使梁启超在摄取伯伦知理思想时也将国家至上的干涉主义思想奉为圭臬。此外，该书第1章对戊戌时期梁启超了解东学的途径及梁初到日本时与日本政界的关系所做的梳理，也是目前国内论述得最为详尽的。总之，该书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专门探讨梁启超思想与日本关系的著作，可以说代表了国内有关这方面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 二、如何看待日本因素

国内外学者关于梁启超与日本关系的研究，不但对梁启超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推进，解开了梁启超思想中的许多迷思，并且也加深了我们对近代中日两国思想文化交流的认识，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然而，在有关梁启超与明治日本关系的研究中，对于如何看待和评价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学术界迄今未予重视，实有展开讨论的必要。

笔者以为，就如何看待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这个问题来说，首先须处理好日本因素与其他思想资源的关系。在梁启超思想研究中，学术界长期以来重视西学因素和中国传统因素，以及两者在梁启超思想中的紧张感，比较忽视日本因素，的确有其局限性。但有些研究梁启超思想东学背景的学者走向另一极端，只讲日本因素，同样也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无助于对梁启超思想的全面把握。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头10年里，明治日本固然是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绝非惟一的来源，同时也有中国传统思想因素和梁氏通过明治日本之外所获得的有关西学知识，诸如19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和有关报刊杂志所介绍的西学知识，严译西学名著，以及梁启超本人亲自游历美洲、澳洲、香港和台湾等地的观感，康有为、黄遵宪等师友的影响，等等。此外，其他一些非思想因素，尤其是国际和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演变，也对梁启超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梁启超思想与明治日本关系时所应注意的。以20世纪初的梁启超新民说理论来说，虽然如《东学背景》和其他学者所说，是受了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等日本思想家和著作的影响，但将梁启超的新民说完全归诸明治日本思想影响的结果，未免失之简单。如所周知，“新民”是戊戌时期即已提出的一个口号，其中又以严复的阐述最为透彻。而严复当时提倡“新民”说，迄今没有资料表明是受了日本思想家的影响，其理论根据是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此外，当时西方人士对中国民族性的讨论也唤醒了戊戌维新思想家们对“新民”重要性的认识。[27]戊戌时期梁启超虽然追随康有为，从事维新变法活动，但对“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也是完全认同的，他本人在发表《变法通议》之后，就曾有意“集天下通人宏著，有当于新民之义者为一编”，批评社会上的通人魁儒对新民之道“熟视无睹，有若可删”。[28]虽然梁当时所说的“新民”，与他流亡日本之后所讲的新民有不同内涵，但两者之间显然有着继承关系。并且，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民说理论，除了是戊戌时期“新民”主张的进一步发展之外，也即受严复和西方社会有机体论思想的影响外，其实与林毓生所说的中国传统“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维模式[29]也有直接的联系。中国传统“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维模式的显著特征，就是强调道德、人心在治理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中国传统所说的“修齐治平”、“人存政举”，便是这种传统思维模式的外在表现，它们与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等人所提倡的学习西方文明之精神以及“一人独立，方能一国独立”的主张，分明有着相通之处。事实上，梁启超本人在宣传新民理论时，也明确将中国这一传统思想作为其理论根据之一。在《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一文中，梁便将《孟子》所说“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的古训作为其理论根据之一。而他所说的“新民”一词，则直接取于儒家经典《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警句。在他所著《新民说》的各篇文章中，梁除大量引用西方和日本的历史事例以及思想家的言论外，也常常从中国传统典籍中摘引相关言论或历史故事，以阐发他所提倡的新民理想的意义。例如在《新民说·论自尊》一文中，为宣传福泽谕吉“一人独立，方能一国独立”的思想，梁就援引了伊尹、孟子、庄子、杜甫等人的相关言论。所有这些事例，无不表明梁启超的新民说理论有着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再者，就非思想因素来说，20世纪初梁启超之所以热衷于新民说理论，又与他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戊戌变法失败后，自上而下的改革遭到失败，梁成为一名纯粹的启蒙宣传家，新民理论自然也就成了最好的宣传主题，正如梁本人在1903年为他宣传新民说所做的辩护中所说：“吾以为新闻记者之责任，其必在于新民也已。”[30]我们看到，随着梁启超的兴趣重新转向实际政治活动，在1903年游美归来之后，他对宣传新民理论的热情便大为减弱，到1906年立宪运动开始后，便完全放弃新民理论的宣传，在《新民丛报》第72号（1906年1月）发表《论民



气》一文之后，终止了《新民说》的写作。并且，仔细追究起来，作为梁启超启蒙思想背景的“东学”，本身就既有西学因素，也有中国传统因素，因此，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在考察梁启超启蒙思想背景中不能完全撇开西学和中国传统因素。

当然，对专门探讨梁启超与日本关系的学者来说，他（她）们在研究中将重点放在日本方面，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十分合理的，但倘若在论证或表述过程中将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完全归诸日本因素，不对其他因素予以适当的关照，这就将梁启超的思想简单化了，并且其所建立的关于梁启超思想与明治日本之间的那种单向度的紧密关系也很难令人信服。

其次，在处理梁启超启蒙思想与日本关系问题上，一些学者采用近似“学案体”的方法，将梁启超思想与某一日本思想家或著作的影响联系在一起，亦须谨慎为之。事实上，对于如饥似渴汲取新知识的梁启超来说，其思想不可能只简单地受某一具体思想家或某部著作的影响。以梁启超与福泽谕吉的思想关系来说，后者无疑在文明论方面对前者产生过影响，但同时正如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指出的那样，文明论是当时日本思想界和舆论界的一个共同话题，梁所置身的世纪之交的日本已不再是福泽谕吉《劝学篇》和《文明论之概略》所标榜的“文明之精神”时代，而是早已经过加藤弘之、陆羯南、德富苏峰等“社会进化论”、“国民主义”、“国权主义”、“帝国主义论”等各种理论和学说过滤的时代，因此，对梁启超的文明论产生影响的，自然不限于福泽谕吉一人，并且，梁启超的文明论自然还会与福泽谕吉有所区别。[31]再如，许多学者都注意到梁启超20世纪初所作的一系列介绍近代西方思想家和学说的论文，大多以中兆江民《理学沿革史》为蓝本，但将梁启超此类文章都归诸《理学沿革史》，可能又会忽略其他日文著作的影响。至少在《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一文中，梁启超明确表示该文的写作除了参考中兆江民的《理学沿革史》之外，另参考了陆奥宗光译《利学正宗》、边沁原著Theory of Legislation、纲岛荣一郎著《西洋伦理学史》和《主乐派之伦理说》、山边知春译《伦理学说批判》、竹内楠三著《伦理学》、田中泰磨译《西洋哲学者略传》、杉山藤次郎著《泰西政治学者列传》、小野梓著《国宪泛论》、冈村司著《法学通论》和有贺长雄著《政体论》。[32]梁氏所列的参考书可能有标榜的成分，但他所写的文章和思想不只受某一日本思想家或日文著作的影响，却可能是真实的，值得认真对待。并且，除了受日本思想家和日文著作的影响之外，梁日常所接触的明治日本社会及其风尚，也必然给他的思想以重大的影响。例如当时的日文报刊杂志，便是梁启超吸取相关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梁在1899年12月所写的《汗漫录》中就提到他初到日本，通过阅读报纸，接触了解日本的情景，自谓“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33]后来，他在所写的《双涛阁日记》里，也将“读报纸”列入他每天的功课之一。[34]此外，梁在文章中也常提到明治日本社会风尚对他的影响，他后来曾这样描述对日本社会风尚的感受：“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之朝气，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献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回视祖国满清政府之老大腐朽，疲癃残疾，肮脏蹒跚，相形之下，愈觉日人之可爱、可敬。”[35]因此，在考察梁启超与明治日本关系时，我们必须对构成梁启超启蒙思想背景的“东学”的复杂性要有相当的体认，须知明治日本思想是由不同的思想光谱组成的，须知梁启超当时除受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中兆江民、加藤弘之等日本著名思想家和著作的影响外，还深受当时日本社会和风尚影响。明乎此，不但有助于我们弄清梁启超启蒙思想的真正来源，而且也可避免我们对梁启超文章中的矛盾进行一些无端的臆测。

再者，在考察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将梁启超视为明治日本思想的简单的抄袭者或被动的接受者，还是将他看作一位具有主体性和创造性的思想家。有些学者在考察梁启超思想与日本的关系时，由于片面强调日本因素，忽视梁启超启蒙思想的其他思想资源，往往单向考察明治日本思想对梁启超的影响，将梁看作一个简单的被动的受体，而比较忽视反向考察梁启超作为一名思想家所做的主体性选择和创造。狭间直树教授在研究中似乎就持前一观点，他曾在《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的日文本的序言中这样强调：“在此，我想提及的是，与其说是梁启超以自己的方式主动摄取明治时期形成的日本文化，倒不如说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培养’了梁启超。”笔者以为，将梁启超说成明治日本思想的被动受体或抄袭者，这是对梁启超思想的进一步简单化，同时也极大地降低了这一研究的思想 and 学术意义。事实上，梁启超本人的文章和一些学者的研究都表明，梁启超作为一名启蒙宣传家和思想家，他在摄取日本明治思想过程中，无论是抄袭，还是客观的介绍，都是结合当时中国的现实和需要，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以及知识背景加以取舍，甚至进行刻意的修改和创造性的阐发。例如，尽管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上的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论》系抄袭平田的《国家论》或吾妻的《国家学》，但在抄袭过程中梁却对译本做了大量的取舍：对日译本中中国人可能不感兴趣的有关叙述欧洲宪制度演变历史的第3卷第4章和第4卷第3章以及第5卷《国家与教会》删去未译；对日译本中第2卷《国民与国土》有关民族与国民、国民与社会部分的内容，也由于梁当时认为“Nation”（族民）与“Volk”（国民）的区别没有意义，反而会引起混乱而被删去；同时因为当时梁在政体选择上尚犹豫不决，因而有关对君主立宪制和代议共和制的分析也被删去；而在1903年梁启超政治态度发生变化后，许多被删去的内容又在他发表的《政治学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重新补上。[36]又如梁所翻译的明治日本政治小说在当时的日本已经过时，它们的意义主要是为梁提供了一种新的宣传工具；并且，在翻译日人柴四郎《佳人奇遇》时，梁除了在康有为的压力之下，将小说中体现反清思想的文字删去之外，还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对其中宣传大日本侵略主义思想和有辱中国的文字亦做了重大的修改。[37]再如，根据日本学者松尾洋二的研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大量西洋人物史传，诸如《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等，虽然几乎是相关日文著作的翻译，但有些史传在经梁的翻译和加工之后，“简直就成为一部思想性著作”[38]。根据台湾学者黄克武的研究，梁启超笔下的康德虽然以中江兆民所译法语国学者富耶（Alfred Fouillee）的《理学沿革史》为蓝本，但也非后者的简单复述，不但译介的内容具有高度的选择性，而且还充满梁个人所做的阐释，既有康德、富耶、中江兆民等人的影子，也有佛学、儒学等思想因素，呈现出各种理念交杂、互释的景象。[39]根据大陆学者蒋俊的研究，梁启超的《新史学》虽然受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的影响，但同时非简单地摘取其中的某些观点或译个别章节，而是着重于融会、改造和创新，进而为外来理论的中国化和中国史学走向世界辟出一条蹊径。[40]不但如此，即使对文章中的一些日语词汇或术语，梁也有所鉴别、批判和创新。例如为避免日语“经济”（Political Economy）一词与中国传统典籍中“经世济民”、“经世济俗”含义相混淆，梁在文章中便曾以“富国学”、“资生学”、“理财学”、“平准学”、“生计学”等取代日语中的“经济”一词[41]；梁在文章中采用日语“论理学”（Logic）一词，则是在比较中国旧译“辨学”和严译“名学”的优劣之后所做的一个择善而从的选择[42]；梁文章中所用的“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一词，系他在综合日译和西文原意基础上所做的一个小小的创新，梁曾解释道：“此派之学说，日本或译为功利派或译为利用派；西文原意则利益之义也。吾今撷括本派之梗概定为今名。”[43]至于梁文章中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表述，又是他对社会学术语中日译“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和严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做的一个综合[44]；对于日语中的“革命”（Revolution）一词，梁启超更是从自己的政治主张出发，曾发表有名的《释革》一文，批评日语中的“革命”一词未能正确地传达近代西方所说的“Revolution”一词的含义，而与中国古代所谓的以暴易暴的易姓革命相混淆，主张以“变革”一词取代日语中的“革命”一词[45]。总之，梁启超文章有所本的事实，绝不意味着他是一个缺乏主体性的宣传家，或是丝毫没有个人创见的思想家；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代“舆论界之娇子”，对近代中国思想界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有关明治日本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研究，实际上应该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受体的梁启超在哪些方面接受了明治日本思想的影响；二是作为主体的梁启超在摄取过程中如何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上述两个层面的研究相辅相成，构成有关梁启超启蒙思想与明治日本关系的完整历史；任何顾此失彼的研究，都是偏颇的、不可取的。

最后，在考察梁启超借途日本汲取西学过程中，似有必要进一步将它放到近代东亚文明转型的角度予以思考和把握，而不仅仅局限于就梁启超论梁启超。东亚各国的历史和国情虽然不尽相同，但相对于欧美西方文明，大体又有着相似或相近的道德和价值取向，构成与西方文明有别的东亚文明共同圈。因此，20世纪之交梁启超糅和西学、中国传统和日本东学，创造新学的过程，不止是梁启超的个人思想活动，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作为世界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东亚文明对近代西方文明的回应，以及东亚文明向近代的转型，深刻揭示了世界近代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并且，需要指出的是，当年梁启超在重建近代中国价值和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他本人就有很强烈、很明确的东亚文明意识。他流亡日本之后创办的第一份刊物《清议报》的宗旨，除了激发中国“国民之正气”、“增长支那人之学说”之外，便是要“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46]在他看来，中国古代文明不止是中国一国的文明，也是东亚文明的代表和象征。梁曾这样明确宣称：“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47]同时，在他当时对

“黄色人种”、“白色人种”、亚洲与欧洲之大势表述中——不管这些表述是祖述当时日本人的观点，还是直接受当时西方学术的影响，我们都可感受到梁启超对东亚文明和东亚国家历史命运的深沉关切和他的世界意识。因此，在考察梁启超借途日本汲取西学知识、重建近代中国价值和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我们还应思考梁启超当年所做的工作对近代东亚文明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启示，从而也可引伸出我们对明治日本思想文化进行深沉的反思，而不再拘泥于单向考察日本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总之，倘若我们能将东亚文明意识自觉地带到有关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关系的研究之中，必将使这一研究更有思想性，也更有价值和启发性。

（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一辑《思想家与近代中国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版）

- [1] 《论学日本文之益》，《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80页。
- [2] 《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186页。
- [3] 《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8页。
- [4] 《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186页。
- [5] 中村志行：《中国文艺に及ぼせる日本文艺の影響》，《台大文学》第7卷第4期(1942, 12)，第214-243页；第7卷第6期(1943年4月)，第362-384页；第8卷第2期(1943年6月)，第27-85页；第8卷第5期(1944年11月)，第42-111页；《〈新中国未来记〉考说——中国文艺に及ぼせる日本文艺の影響の一例》，《天理大学学报》第1卷第1期(1949年5月)，第65-93页。按：本文所介绍的有关研究梁启超与明治日本关系的日文论文，若未译成中文，均系从相关论著的引注中求得，未加核对和阅读原文，若有不确，请有关学者批评、纠正。
- [6] 《信州大学人文科学论集》第1号(1967年)、第2号(1968年)。另，狭间直树教授后来也写过一篇相关的短文——《初到日本的梁启超》，载广东康梁研究会编《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229页。
- [7] 《中国——社会と文化》第5号，1990年6月。
- [8] 有关狭间直树教授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贡献详见[日]石川祯浩着、黄自进译《狭间直树先生》，（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5期（1998年3月）。
- [9] 有关这次学术会议和论文的简要详见黄克武《欧洲思想与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精英文化研讨会》，（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1期。
- [10] 狭间直树：《梁启超研究与“日本”》，（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4期（1997年9月）。
- [11] 有关各篇论文的详细内容请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该书的中文书评见桑兵《梁启超的东学、西学与新学——评狭间直树〈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一文，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 [12] [美]张灏著、崔志海等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105页。按：有关美国学者李文森和张灏的梁启超思想研究可参见拙文《评海外三部梁启超思想研究专著》，《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 [13] 详见Philip C. Huang, Liang Ch' i-ch' 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pp. 36-67。
- [14] Ibid., p. 161。
- [15] [法]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 [16] 详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第400-457页。
- [17] 彬彬（徐彬）：《梁启超》，1929年1月26-28日《时报》，转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 [18]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49页。
- [19] 按：随着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和70年代末中国国内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内学术界逐渐由过去的单一研究日本侵华史，转向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和中日两国的近代化比较研究，从而带动了国内学者对有关梁启超与明治日本关系的研究；而在以研究日本侵华史为取向的学术语境中，讨论有关梁启超与明治日本的话题，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
- [20] 姜启：《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与日本的明治文学》，《聊城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陈应年：《梁启超与日本政治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及评价》，杨正光主编：《中日文化与交流》（第1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129页。夏晓虹：《梁启超与日本明治小说》，《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传世与觉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271页。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17-246、264-285页。王中忱：《叙述者的变貌——试析日本政治小说〈经国美谈〉的中译本》，《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第39-43页。按：在这些论著中，以王晓平和夏晓虹两位学者的研究最为系统，也最有学术价值。
- [21] 王秀华：《梁启超与日本明治维新》，《日本研究》1986年第2期；周佳荣：《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思潮》，《清华大学学报》90年5卷2期；夏晓虹：《传世与觉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第177-200页；谢俊美：《梁启超与日本》，《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沈大明：《梁启超与日本》，华东师范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日中文化研究会主编：《现代化与社会文化》，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204页；蒋广学：《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23-37页。
- [22] 高力克：《福泽谕吉与梁启超近代化思想比较》，《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徐剑梅：《福泽谕吉和梁启超的政治革新观比较》，《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郑浩澜：《福泽谕吉与梁启超国民思想之比较》，《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 [23] 蒋俊：《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文史哲》1993年第5期。盛邦和：《东亚：走向近代文明的精神历程——近三百年中日史学与儒学传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339页。
- [24] 焦润明：《梁启超的日本观》，《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 [25]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294页。
- [26] 黄克武：《梁启超与康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1998年12月），第101-146页。
- [27] 有关戊戌时期新民思想产生的背景及有关维新派对国民性的反思可参见拙文《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先声——论戊戌维新派对传统文化心理的反思》，《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
- [28] 《经世文新编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7页。有关梁氏新民思想的演变可参见拙文《梁启超〈新民说〉的再认识》，《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
- [29] 详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 [30] 《答飞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43页。
- [31] 石川祯浩：《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第95-119页。
- [32]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46-47页。
- [33]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186页。
- [34]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九，第2-40页。
- [35] 吴其昌：《先师梁任公别录拾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36辑，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
- [36] 详见[法]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按：巴斯蒂教授所做的这一研究，实际上否定了她在论文中提出的梁启超在摄取明治日本思想中只是“不折不扣抄袭”或“丝毫没有他的个人创见”的观点。
- [37] 详见王宏志《“专欲发表区区政见”——梁启超和晚清政治小说的翻译及创作》，《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



中心1999年版，第126-129页。

[38] 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第278页。

[39] 详见黄克武《梁启超与康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1998年12月），第101-146页。

[40] 详见蒋俊《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文史哲》1993年第5期。

[41] 参见[德]李博著、赵倩等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201页。按：在流亡日本期间所写的文章中，梁启超偶尔也使用日语“经济”一词，但为避免与传统典籍中的“经济”一词含义混淆而产生误解，在使用时有时加了注释。

[42] 《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3页。

[43] 《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30页。

[44] 《自由书·放弃自由之罪》，《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23页。

[45]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40-44页。

[46] 《清议报叙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31页。

[47]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页。

文章录入：zhangzhiyong 责任编辑：zhangzhiyong

- 上一篇文章： 贞节观念的现代诠释：以潘光旦为例
- 下一篇文章： 刘大年与〈评近代经学〉

[【发表评论】](#) [【加入收藏】](#)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

-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 增长与公平：梁启超与孙中山
- 梁启超为康有为弭祸 ——近世
- 论戊戌前后梁启超保教思想肯
- 从晚清上海看女性家庭角色的
- 梁启超论新民德与国民生计
- 梁启超与日本——评郑匡民《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邮编：100006 传真：65133283